

商城记·东莞

虎头门开向二洋

明永乐十九年(1421年),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,同一年,郑和奉旨六下西洋。此乃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,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远征。

关于本次下西洋的准确日期和实际出发港,史书上记载不一。近年来,据广东学者考证,郑和船队很可能是在当年十月中旬,由华南大港广州放洋出海。而早在14年前,即永乐五年九月,郑和二下西洋,也是从广东起航。

下西洋的东莞人

明代东莞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。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,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。

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,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,规模都极为庞大,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,总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,又以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,约在九成以上,除军事任务外,他们还要承担各类工作。

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,往往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,很多人有去无回,史书有云“三保下西洋,费钱粮数十万,军民死且万计”。郑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(1433年)七下西洋时病逝于海外,导致整个远征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。

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兴师动众,劳民伤财,也早让朝中诸多高官觉得很不自在,他们有意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料。

靠海吃海 在商言商

除了沿海走私之外,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,直航东西洋诸国,即今东南亚地区,走私贩私,从贸易中获利。

永乐元年(1403年),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,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,在北方频频用兵,同时四出遣使,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。他下令恢复了洪武年间罢废的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三个市舶司,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。

当时海外各国朝贡(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),日本取道浙江,琉球取道福建,安南(今越南)取道广西,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。因此,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,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

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印象中,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,大多从福建出海的说法,有所出入。更有意思的是,现存极为有限的资料显示,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,有若干广东籍人士,尤以东莞人居多。

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,与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业发生联系,既在意料之外,亦在情理之中。

料。故除了郑和本人在《明史》立传外,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理干部的生平,只留下一些零星星星的材料,大多数普通随员的事迹,则几乎湮没无闻。

尽管如此,经过当代中国及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,仍从史料中梳理还原了至少60多位随员的资料,他们大多来自江、浙、闽、粤等东南沿海省份。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,有名有姓、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员共12人,东莞籍的占了5人,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。如果按此比例推算,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千多人中,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。

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,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?

重、规模最大、作用最突出的,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,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,有各类房舍120间。

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,在明廷官方来说,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,慑服海外诸藩,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,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。

明代广州人郭秉在万历三十年(1602年)所修《广东通志》中记载:永乐五年九月“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,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”。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,船队从广东启航后,所经国家有占城、爪哇、暹

“万里天险,与诸番共之”

“广州海亦有三路,分三门,而以虎头为大门。潮汐之所出入,东西二洋之所往来,以此为咽喉焉。”

郑和七下西洋,固然让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华王朝声威远播,但为此付出的财政负担也相当沉重。明人所著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中说,下西洋“须是动支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,方才够用”,恐怕不全是夸张的话。故当年宦官四出搜刮财宝,为朝中大臣诟病之事实,多见于史书。在广东地方志上,也留下了若干记录。

明嘉靖年间黄佐编纂的《广东通志》之“民物志”内,提到永乐年间采珠事三次,头两次就在东莞县。第一次是永乐四年(1406年)春三月开始,“东莞军人王保

量珍珠,作为航行至各藩国时分封、赏赐之用,曾派重兵把守该珠池。东莞籍军人屡次献计采珠,不排除是以此图进身之阶,或借机中饱私囊。

永乐四年第一次在东莞采珠,与永乐五年郑和二下西洋从广州出发,时间上颇为吻合,有学者推测两者之间或有直接关联。因此,在郑和下西洋的宏大事业中,东莞地方扮演的角色,实在不可忽视。

二百年后,大明江山已经变色,寓居东莞的明朝忠贞遗民屈大均,在他的笔记名作《广东新语》里,详细描述了广州港海口

群英志

“东莞伯”传奇

明洪武元年(1368年)四月,明太祖朱元璋麾下征南大将军廖永忠,率舟师自福州经海路到广东潮州,再南下至东莞县。当时控制岭南军政的头号实力派人物何真,带领部属官佐出城相迎,随即出榜招降诸寨,又与明军合力发兵,平定不肯归顺的其他地方势力。很快,南粤各地都改换了大明旗号。

朱元璋自举义以来,十余年间,除乘势将元蒙统治集团逐回漠北外,还南征北战,东讨西伐,经连番恶战击败陈友谅、张士诚、方国珍等主要竞争对手,又以强大武力扫荡福建、云南、四川、陕西、辽东等割据势力,唯有广东一地,是没有大动干戈而“和平解放”的。故当何真奉诏赴南京晋见皇帝时,两人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——

朱元璋:“顷者师临闾越,卿即输诚来归,不倾一旅之力,使兵不血刃,民庶安堵,可谓识时达变者矣。”

何真:“今幸遇大明丽天,无幽不烛,臣岂敢上违天命!”

纵观何真生平经历,他看起来确实是一个身处乱世之中,有很强烈的号召力和管治力,却没有过分政治野心的奇人。

何真是东莞人,先祖在宋室南渡时经广东南雄珠玑巷迁来,至其祖父时已成为当地富户巨室。元至正初年(1341年左右)他20来岁时,出来当过一阵子地方官吏,不久回乡闲居。至正十一年(1351年),刘福通在江淮之间起事,元末农民战争爆发,很快波及广东。珠三角周边的惠州、南海及东莞等地贫苦乡民纷纷暴动,一时“岭南骚动”。



在明人茅元仪所著《武备志·郑和航海图》中,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,图中上部可见“东莞”字样。

原来,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人员,多出直隶(迁都北京后又称南直隶,大致是今江苏、安徽两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)和南京行在卫军,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。一般军官和士兵,都是从各个卫所调拨。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,多从闽、粤、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选,大量民夫、杂役,则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。

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从广东出海,当地壮丁应征随行,就是很正常的事了。如明嘉靖十

四年(1535年)编纂的《广东通志初稿》中就提及,永乐十九年时,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韶州(今韶关市)时,征用民夫、骚扰地方情形。

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“吾粤中路咽喉地”,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,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(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)。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,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。

这些东莞人在“征西洋”过程中也屡屡立功。如东莞县人钟左,因

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间在日港(印尼第一大岛,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,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政机构)接受招安归国,他本人蒙荫加入锦衣卫,“下西洋二次有功”,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僉事。东莞县人李真、陈永华,多次“赴西洋公干”有功,升任锦衣卫镇抚司。

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“父子兵”黄子成、黄本奴,父子成出身卫所,早年在海途中殉职,子本奴递补,数下西洋,因功先升总旗,再升百户,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。

“到十六世纪末,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、锦石、泗水、饶洞、万丹、日葛礁和其他岛屿(苏门答腊、西婆罗洲)上,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。”

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,在当地站稳脚跟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。有可靠的文献记载,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,在郑和的认可和主持下,甚至成为旧港“大头目,以主其地”,并传位给子女,俨然称王。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。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。

的万千气象:

“广州海亦有三路,分三门,而以虎头为大门。虎头者,天地之阳气所从入……海者地之宗,故祀南海神于虎头门之阴。门在广州南,大小虎两山相束,一石峰当中,下有一长石为门限,潮汐之所出入,东西二洋之所往来,以此为咽喉焉。出虎头咫尺,则万里天险,与诸番共之。诸番非表而吾非里也,大唐之地止乎此。”

虎头门,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东莞虎门,为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,外洋船舶进出广州港的必经之地。屈大均又有一主流传甚广

前面提到过,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,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,于旧港“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,升正千户”。华人移居海外,喜欢聚族而居,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,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,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。

此外,元朝末年,群雄并起,时任元地方官的东莞人何真,也以东莞、广州为基地,一度凭险而守,割据岭南,后来审时度势,归附明太祖。他麾下很多东莞籍军人被调往南京行在充当卫军,估计就有获选拔随郑和下西洋者。

的竹枝词,缅怀大明盛世时的“金山珠海,天子南库”:

洋船争出是官商,十字门开向二洋。五丝八丝广缎好,银钱堆满十三行。

遥想当年,郑和使团两度浩浩荡荡由此起航下西洋时,竖船巨舰上的万千官兵,包括那些刚刚挥别家乡父老的东莞人,也必定为生逢盛世而心怀骄傲,为即将展开的扬威之旅振奋不已吧。

永乐四年明廷第一次在东莞采珠,与永乐五年郑和二下西洋从广州出发,时间上颇为吻合,两者或有直接关联。因此,在郑和下西洋的宏大事业中,东莞地方扮演的角色,实在不可忽视。



风云录

四海之内 皆莞人也

明清时期,广东商人在国内各地非常活跃,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,东莞商人作为“广府帮”的一分子,漂洋过海,异国谋生,是司空见惯的事。郑和历次下西洋,不仅与侨居当地的莞籍商民打过交道,他的使团中为数甚多的东莞官兵,也有可能最终留驻他国,生息繁衍。

明代中后期,葡萄牙人、英国人相继登陆广东沿海,地当咽喉的东莞的边民们,也是较早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一群人,他们有更多的机缘走出虎头门,向“诸番”的天地发展。

东莞商人经营的重要货物,除早已蜚声海内的“莞香”外,还有砂糖,因东莞所在的珠三角地区盛产甘蔗,最适合种糖。包括莞商在内的广东糖商,历来有贩糖出海贸易的传统。如明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,从广州起航经澳门运往印度和欧洲的砂糖,约有200~300担,利润率为100%~150%;而运往日本长崎的砂糖,达到210~270担,利润率为100%~200%。这些砂糖,相信有一部分就是来自紧邻广州港的东莞县内。

到了清代,闽粤之人下南洋已成潮流。据暨南大学历史系刘正刚教授等学者考证,清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,就有东莞人前往马来西亚的檳榔屿从事开采锡矿和割橡胶的工作。鸦片战争之后,国门洞开,东莞人移居国外者更明显增多。根据史料记载,自东莞县分出设置的宝安县(辖今深圳、香港大部分地区),商民出外尤多。

如1845年,有宝安人赴美国加州淘金;1850年,宝安人到了巴拿马运河经商;1854年,宝安人就远赴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,后加入当地的中华会馆。1860年左右,宝安人不仅出现在苏门答腊北部亚齐及棉兰一带,从事种植或经营胡椒生意,还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南美的圭亚那,从事甘蔗种植。

1888年,宝安人陈福移居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主岛大溪地,经营小商品及香茅生意;1890年,夏威夷檀香山的商场中也有了他们的身影。至于离中国本土较近的日本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国,宝安移民亦复不少。

飘零海外,东莞人也像其他大多数侨居异国的华人一样,非常热心参与同乡的社会组织活动,尤其是本籍商民发起组建的会馆。1874年,广州府属的南海、番禺、顺德、

香山、东莞等侨民在缅甸成立了五邑会馆。19世纪下半叶,美国旧金山有广东人建立的六大会馆,其中的阳和会馆,即由香山、东莞籍侨民合建,人和会馆则由新安(即宝安)、归善(今惠州)等县合建。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地,东莞人还组建了东安会馆,遍布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檳城、芙蓉等重要城市。



东莞迎恩门城楼旧照。此城楼始建于明代洪武十七年(1384年),见证了这座南粤名城600余年沧桑史。

一开始,何真以元朝前地方官身份,出面请求官府调兵剿捕乱党。后见官军无力控制局面,便动员族人和家丁举兵,与东莞境内各派造反者抗衡。他接受了元江西行省(辖现广东省一部分)授予的“惠州路总管”衔,旋因功升至“惠州路总管”,全家从东莞迁到了惠州。

后来,何真所部兵力日渐壮大,不仅打下东莞全境,且攻破了

叛军占据的广州。元廷再次论功行赏,任命他为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右丞,治所在广州,“东连潮惠,西连苍梧,皆真保障”,几乎将半个广东揽入囊中。此时,有人劝他效仿西汉南越王赵佗,割据岭南,自立为王,他当即“执而戮之”。

归附明廷后,他曾向朱元璋透露“心迹”：“臣本蛮邦之人,始者逢乱,不过结聚乡民,为保生计,实无

他志。”而与广东境内其他几支声势较大的反元武装力量动辄肆意焚掠,毫无纪律相比,何家军控制的地区却“号令肃肃,广人大悦”,确实与别不同。而且他也没有像中原群雄一样,积极向外拓展势力,只是练兵据险,保境安民,使“邻敌不敢窥其隙”,保持了岭南社会在元明交替之际的相对安定。

何真治下的广东地区,在元末明初大规模统一战争中,是唯一明军未曾大兵压境即主动归附的特例,本地的人口和经济,都没有受到战火的大肆破坏。因此,明代广东经济,特别是中外贸易的商品经济有长足发展,并能够在人才和物资上大力襄助郑和下西洋之壮举,何真的明智选择,实在是功不可没。

何真归明后,忠心耿耿,办事尽责,生性冷酷猜忌如朱元璋,也对并非嫡系的他“推心委任勿疑”,几次委派他回广东老家招降纳叛,稳定地方。而深谙进退之道的何真,也安然避过朱元璋对功臣武将们的残忍杀戮,顺利退休。

洪武二十年(1387年),67岁的何真告老还乡。朱元璋特地敕封他为“东莞伯”,食禄1500石,赐钞万贯,还在京师赐府第,真是极尽荣耀。次年三月他病逝时,朱元璋亲自为文致祭,命以侯礼葬于京师之郊。

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撰写,感谢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庆新研究员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陈梧桐教授、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提供的支持。东莞冠冕集团也为本专题撰写提供了必要的方便。